

#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 世纪回顾

旧石器时代  
考古卷

吕遵谔◎主编

#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 世纪回顾

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

王德成主编

#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

## 旧石器时代考古卷

吕遵谔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分五卷出版。本书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由我国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学者撰写而成。它总结了20世纪我国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的发现、研究成果及工作中的不足。

本书在按地区划分的基础上，以时代的早晚排列顺序编写。人类化石都附于有关地区条目之下，文中有图，文末附有较详细的参考文献。本书内容丰富，材料集中，反映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工作者的最新观点及在理论方面的新探索。

本书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的重要读物，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师生、研究人员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吕遵谔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ISBN 7-03-012068-X

I. 中… II. 吕… III. ①考古—中国②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002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 责任校对: 钟 洋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8 1/2

印数: 1—1 200 字数: 662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 序

即将出版的、由吕遵谔先生撰写总论（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瞻望）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是一部好书，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推动力。对过去的工作指出不足，善意地纠正缺点，互帮互学，共同前进，后望大焉。

一个人对自身过去所做的工作，都应当有所回顾。看看自己所走的路是否正确，一有偏差，即应迅速改正，古人说：“有过必改，得能莫忘”，乃是做人的应走的成功之路，治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本书包括的地区和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大地。从事旧石器考古工作的人员前后至少说有两三代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中国旧石器的存在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但由于地层和时代不清楚，中国的旧石器并未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直到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之后，继之又发现了石器，才使这门学科得以建立。

对过去人做的工作，不能要求尽善尽美，只要有发现，并能根据所发现的材料写出可靠的论文，就得说对本门学科有贡献。对任何工作“削足适履”，也是不行的。那样，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早晚会得到公正的评论。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3~1882)的著作，不是也有人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意见吗？意见应当提的，还得提，不然就没有进步了。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达尔文，因为他是首倡进化论者。100多年前提出的理论，完全合乎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

有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过去以器型来命名旧石器，如大、小尖状器等，因为可能是不知其用途的缘故。重达一公斤多的大

三棱尖状器是否可以作为刨土的工具——镐头使用呢，据说已有人这样认为；而像指头肚大小的小尖状器，我就不知道其用途了。有人说，类似于“铤”（不知其正式名称），或像啄木鸟从树干上“铤”出虫子吃那样使用。因为没有做过详细的实验，就不知晓了。这一点，正说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一些名称，还待统一，否则会妨碍交流和对比。期待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使我国旧石器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提高，更上一个新台阶。

这本书有10余人参加写作，其中有老有小，多是有名之士，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然比过去的认识前进一大步。正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超前人”，是一点也不错的。

我们只要把青年扶起来，他们就会向前奔跑；而且跑得比我们快得多，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我写过不少的小文章，目的是在本门学科“招兵买马”，使青年学者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道路上前进。这门学科只要在祖国大地上开花结果，我就心满意足了。

贾兰坡

2000年11月21日

# 目 录

序 .....	贾兰坡 (i)
---------	---------

## 总 论

20 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瞻望 .....	(3)
----------------------------	-----

##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周口店地区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	(29)
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 .....	(72)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 .....	(84)
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	(111)
河北、河南和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 .....	(146)

##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 .....	(169)
吉林省旧石器时代考古 .....	(179)
辽宁省旧石器时代考古 .....	(194)

## 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陕西省旧石器时代考古 .....	(223)
甘肃省旧石器时代考古 .....	(238)
宁夏回族自治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	(245)
内蒙古自治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	(2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旧石器考古 .....	(254)

## 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观音洞文化研究杂谈 .....	(257)
盘县大洞遗址 .....	(278)

西南若干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问题·····	(292)
-----------------------	-------

### 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郧县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313)
三峡地区的旧石器·····	(340)
长江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370)
长江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392)

### 两广、台湾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

广西百色旧石器遗址·····	(411)
东南地区的旧石器·····	(428)

### 年代学的研究

年代学的研究·····	(437)
后记·····	(447)



# 总 论



# 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瞻望

##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简史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一样是在外来力量影响和推动下产生的。因此，在其初期，似可以说是受外人控制的历史。旧石器文化研究最早的是从法英两国开始的。首先是法国考古学家波尔特（Boucher de Perthes, Jacques, 1788~1868）于1838年在法国索姆河畔发现旧石器，认为是原始人类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法国北部曾有史前人类活动的证据。1868年，英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对在索姆河畔发现的石器进行了核查，确定了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后来，拉尔泰（Eduard Lartet）依据动物化石把旧石器时代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1868年，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Gabriele de Mortillet）首次用考古学方法将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分期并用第一次发现的地点作为各文化期的名称。后来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Breuil, Henri-E'douard-Prosper, 1877~1961）在莫尔蒂耶分期的基础上提出在莫斯特文化期（Mousterian）和梭鲁特文化期（Solutrean）之间增添奥瑞纳文化期（Aurignacian），从而完备了成为世界旧石器时代分期标准的法国旧石器时代年表。直到今天，该分期年表仍被应用。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在此以前，我国未见报道过旧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当时许多人也不相信中国存在过石器时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产生是和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外强文化侵略有关，如当时的俄、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者，都纷纷来我国西北地区盗掘和掠夺诸多文物。如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Stein, Aurel, 1862~1943）在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下，于1900~1916年先后三次进入我国新疆、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在这期间，他盗掘了许多古代遗址、掠走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批写经和幡。1930年他计划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第四次考察，由于我国学术界人士反对而未能得逞。又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 Paul, 1878~1945），1900~1902年曾三次来中国搜集图书资料。在京期间曾参预使馆区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活动。1905年8月，他受法国金石铭文与艺术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的委派于1906年8月底进入我国新疆喀什地区和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盗掘了库车附近的佛寺遗址，掠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死文字文献。特别是1908年2~5月，继英国斯坦因之后，又攫取了敦煌写经精华部分数千卷及幡幢、绘画等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和文献资料都在《伯希和考察队丛刊》和《伯希和考察队考古学丛刊》发表。

由于外强势力多次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盗掘和偷抢了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入侵者不得不改变单枪匹马的方式以双方合作的方式进行考古调

查研究。如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 (Sven Anders, Hedin, 1865 ~ 1952) 从 1893 ~ 1907 年先后三次进入塔克拉干大沙漠, 直到罗布淖尔、甘肃和内蒙古等地, 绘制 500 余幅地图, 收集到许多佉卢文和汉文文书, 并对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进行地理考察。而第四次考察则与中国学术团体联合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双方分任团长在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等地进行多学科的大规模综合考察。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是在外强力量单枪匹马地来我国寻找动物化石、进行旧石器调查的过程中萌芽而产生的。1921 ~ 1925 年,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家古生物学家葛兰阶 (Walter Granger) 到四川省万县盐井沟收购化石, 当地居民挖掘洞穴、裂隙和“天坑”中埋藏的动物化石, 一麻袋一麻袋地廉价卖给葛兰阶, 装船运往美国。葛兰阶在江南搜寻古人类化石并调查旧石器。他采集的所谓“旧石器”, 都是没有层位、时代不详或“假石器”。1920 年, 法国神父桑志华 (Emile Licent) 在甘肃省庆阳的赵家岔和辛家沟进行调查时, 发现了 1 件石核和 2 件石片。这是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1921 年, 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 (J. G. Andersson, 1874 ~ 1960) 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 (Otto Zdansky) 到周口店调查, 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发现了周口店第一地点, 即北京人化石产地, 但未发掘。1922 年桑志华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并发掘了萨拉乌苏遗址。1923 年, 巴黎国立博物馆派遣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 ~ 1955) 和桑志华二人到鄂尔多斯一带调查,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了一处内容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随后他们又再次发掘了萨拉乌苏遗址, 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及一颗人类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该幼儿牙齿化石经加拿大籍古人类学家步达生 (Davison Black, 1884 ~ 1934) 研究后, 定名为“鄂尔多斯牙齿” (Ordos Tooth), 即习惯上称为“河套人。”

这些零星的发现不仅说明中国大地上曾生活过古老人类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存在, 更有旧石器时代古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发展繁衍。同时也刺激我国学术界投入寻找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至此, 国外力量在中国单枪匹马的进行考古调查和盗掘的历史结束。

根据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展的情况, 大致可以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历史划分为如下 5 个阶段:

### 1. 创业期 (1920 ~ 1937 年)

这一阶段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萌芽期, 像初生婴儿在蹒跚学步但健康地成长起来。自 1921 年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北坡发现了北京人遗址, 1921 年和 1923 年先后发掘获得两枚人类牙齿化石并被定为人属。由于这一重要的发现, 1927 年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步林 (Birger Bohlin) 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对第 1 地点, 即北京人遗址进行大规模系统地发掘, 获得一枚人的左下恒臼齿。先后发现的这三枚人牙, 经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研究后, 命名为“北京中国猿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现改称为“北京直立人” (*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 年, 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周口店第 1 地点的发掘, 于 12 月 2 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以后又发掘了石器和用火遗迹，从而确定了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有直立人阶段的存在，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发掘第一地点的同时，还发掘了周口店第3地点、第9地点、第13地点、第14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遗址（详细情况参见本书《周口店遗址》）。因裴文中于1935年赴法国从师布日耶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所以周口店的工作就由贾兰坡负责。于1936年11月15日连续发现两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于11天之后，即1936年11月26日又发现一个更为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因此，研究北京人的魏敦瑞（Frang, Weidenreich, 1873~1948）说：“自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之后，即无头骨发现，此次在11天之间，发现三个完整头盖骨，实出人意料。”<sup>①</sup>

1936年是发掘工作丰收的一年，除零星发现北京人的化石以外，11月份发现三个较完整的头盖骨。1937年收获也不错，春季陆续发现了北京人牙齿、头骨碎片、下颌骨残片和一块眉嵴骨。其中眉嵴骨是1936年11月15日发现的第二个头盖骨所缺失的部分，二者可以复原。特别是从8~9层的29水平层发现了一块左侧上颌骨，上面还带有6颗牙齿。这件上颌骨过去从未发现过。有了这件标本就可以复原北京人的面部。这一季度的发掘除了成批的发现动物化石和不少石器以外，还发现了一副几乎完整的葛氏斑鹿和两副几乎完整的肿骨鹿的骨架，这也是从前未发现过的。

由于“芦沟桥事变”，1937年的发掘于7月9日挖完第29水平层就停工了。在发掘工作人员撤离周口店之前，由于担心日本人前来发掘，所以将发掘的层面又用土、石填盖了30厘米厚。果然，1942年4或5月，日本军部的人把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带到周口店，逼问其工作和发现情况，并扬言要发掘周口店。但最后未能实现，可能和发掘面被回填有关。

中国旧石器时代创业期，匆匆地走过了17个年头。在这期间于甘肃庆阳首先发现有地层记录的打制石器，确立了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存在。接着在发现和发掘了内蒙古萨于乌苏遗址并获得河套人的牙齿；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掘了水洞沟遗址。当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发现和工作当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及研究。发现意义重大、收获颇丰。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北京人的材料约40余个个体，其中完整的头盖骨5个。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制品10万余件；用火遗迹多处；哺乳动物化石90余种。根据古生物地层学认为，北京人的时代距今约50万年。当时气候温暖湿润，人们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旧石器田野发掘方法的改进。因为1927~1931年的发掘因未严格控制地层的上下关系，记录也不详细，给研究工作造成很多困难。1932年起改用“方格法”，即在发掘面上布“方”（一平方米，深半米为一方）每方都有各自的编号，按方发掘，挖出的土石也按方堆积摆放，经过筛选再处理。发掘前按每深半米为一水平层，每水平层都绘制同样比例的平面图。每隔2米绘制了同样比例的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剖面图并标出自然层。重要的标本都需经过测量，都绘在平面和剖面图上。除这些规定以外还有“照相纪录”和文字纪录。为此，中国旧石器时代具备了科学的发掘方法，为以后的

<sup>①</sup> 引自贾兰坡等：《周口店发掘记》第108页。

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改进繁重的运土工作，改用架装钢索空中的滑轮运输，这种方法比人工抬运效率提高了33倍。

在这一时期除重点发掘第1地点以外，还发掘了第13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遗址。根据发掘所得的资料观察和研究，可以认为周口店时代最早的是第13地点，第1地点底部堆积相当于第13地点，再晚些是第1地点中部堆积，属于典型的北京人时代，第1地点的上部堆积和第15地点的时代相当。上述地点的地质时代都属于中更新世中、晚期，科技测年的时代为距今20万~70万年。而山顶洞遗址则属于晚更新世，距今18000年。

创业期的收获是巨大的。就北京人遗址而言，硕果累累，对研究当时人类的体质特征、文化内涵及古地理环境和气候都是重要的原始资料。

## 2. 艰难期（1938~1948年）

这一阶段是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亦即周口店遗址的研究和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芦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驻了房山县城，不久龙骨山也驻了日军。他们在龙骨山顶修建了碉堡，在山上挖了战壕并用铁丝网将龙骨山圈了起来。一时间原本生气勃勃的龙骨山变成了人不能入，鸟不愿前进的恐怖禁区。不仅如此，日军还将留守龙骨山的发掘工人赵万华、董仲元和萧元昌三人于1938年5月3日以“抗日便衣队”的罪名绑赴房山县城，严刑拷问当地抗日人员的去向和姓名。三位工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没有使敌人得到任何东西。他们被日军用刺刀挑腹杀害了。死的时候，横眉立目，毫不屈服，表现了中华男儿的气概。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我们后人永远不会忘记。

“多行不义必自毙”，千真万确。北京解放之初，笔者曾在龙骨山见到一块高约1米，宽约40厘米，厚约10厘米的石碑，上面刻有“大日本皇军牺牲纪念碑”。后来这块碑石被工人搬到老牛沟边上的开水房外作打开水的垫脚石，后来就不知到何处去了。如果找到这块碑，可以放进北京猿人展览馆内，标出说明，让参观的群众永远记住龙骨山曾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摧残，破坏我龙骨山并遭受我国人民的反抗这段历史。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北京人化石丢失和大量发掘资料及标本被日军掠夺并被焚毁。北京人化石丢失和当时的协和医学院有关。因为北京人的全部化石都放在协和医学院保管。如此重要的标本而且是中国人发现和发掘的，为什么不由中国有关单位保管却要放在协和医学院呢？事情是这样：自从1921和1923年发现北京人牙齿化石经步达生研究以后，他很高兴并决定将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纳入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中，为了实现他的设想，于1926年10月5日他向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写了报告，建议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钱资助发掘周口店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10月16日，步达生又找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翁文灏商量促成他的计划。步达生提出：“①本研究项目采取同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②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研究，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10月18日翁文灏给步达生的回信答复说：“关

于周口店研究：我完全赞同您对周口店研究所提出的建议。……我对于提出的有关材料分配和人类及其他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建议深感满意。……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

1927年2月上旬，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订立了发掘周口店的协议书，共计四款，其主要内容第一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赠与二万四千美元作为到1929年底两年期间的研究专款。第二款：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博士在双方指定的其他专家协助之下负责野外工作。第三款：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第四款：一切研究成果均在《中国古生物志》或中国地质调查所其他刊物上以及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出版物上发表。

从上述步达生给翁文灏的信件及协议书可看出，经费和人类化石研究权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中国学者只能进行动物化石及地层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而田野的负责工作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指定专人负责和研究。所以步达生于1934年3月15日去世后，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德国犹太人魏敦瑞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不难看出，当时周口店的工作实质上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

步达生即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据协议书规定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只能在该院保存，具体地点是该院B楼底层步达生和魏敦瑞的工作室，化石放在保险柜内。

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北京的美国侨民纷纷回国，北京人化石的安全成了人们焦心的问题。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将化石运往美国保存。

约在1941年10月或11月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一些灵长类化石装了两个大木箱。一个箱子上标有CADI字样，另一箱标着CAD2。箱子装好后即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的办公室，当天就被送到楼下4号保险室内，过了一夜又被运走，运到何处便不知道了。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第二天即12月8日，日军即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机构，北京人化石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至今渺无音息！

不仅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丢失，就连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办公楼周口店第1地点、第3地点、第9地点、第13地点、第14地点、第15地点、山顶洞及在国内其他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67箱及出版书籍30箱都被日军运走，一部分被焚毁。多年来调查，发掘采集到的十分重要的研究标本和文献资料遭到日军的野蛮破坏，许多资料、图书和标本在东皇城根焚毁，让人十分痛恨和惋惜。物受损失，人也遭殃。凡是接触过北京人化石的人都受到日本宪兵队的调查、抄家和逮捕。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裴文中先生就受到宪兵队的盘查，并说：最近两个礼拜中，不许你出门，而且要“永远地”在家，随时等宪兵队来谈话。在另一次的谈话后，裴文中先生的居住证被没收了。日本宪兵队并抄走了裴文中先生的大量图书和资料。后来，裴先生将其部分图书捐赠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时，还有一些成捆的图书在麻绳的结扣处贴着“大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封章。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马文昭教授也因北京人化石下落问题进过日本宪兵队。就连在博文办公

室工作的服务员常文学也被捉进了宪兵队。

大约在 1942 年的秋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北京人化石在天津找到了。日本人要找一个认识北京人的人去辨认真假。但该人到天津下火车时被日本人拦住，并说：在天津找到的东西和北京人无关，让该人当即返回北京。从此以后，日本人再也不提“北京人”的事了，直到日本投降，“北京人”的消息杳然，日本人也再也没有寻找。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原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集中力量清理被日军破坏的标本和资料，一直到 1948 年底。

因为建国以前的旧石器考古工作，主要是周口店的发掘，国内其他处没有发现，因此，这一时期的成果和情况，只能以周口店的工作为代表。

### 3. 发展期（1949~196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短短的 18 年中，据初步统计发现的重要人类化石地点和旧石器地点近 20 处，积累了大量的标本和资料。

新中国的建立，为周口店带来曙光。以前在整理被日寇破坏和弄乱的标本工作仍在进行。在大堆的碎骨片中找出了北京人的肱骨和胫髌各一小段。另外的工作是向人民政府交接新生代研究室的财产——整理完毕的标本清册。最重要的是停止了 12 年之久的周口店发掘工作恢复了。这时正是国家的艰难时期，可谓百废待兴，经济很困难，但政府十分重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49 年 9 月 27 日开始继 12 年以前发掘完毕的 29 水平层发掘 30 水平层，发现了两颗猿人下臼齿和一颗上内侧门齿。以后经过 1951、1958、1959、1960 和 1966 年 5 次发掘，共获得北京人牙齿 2 枚、石器若干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通过发掘证明了洞穴的底部堆积，其时代和第 13 地点相同，在 13 层堆积中发现 1 件用砂岩石片制成的石器，进一步证明，早在北京人遗址底部堆积形成的时期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了。

这一时期，北京人遗址另一个重大发现是 1959 年在第 10 层中发现 1 件比较完整的属于老年女性的北京人下颌骨，同层所出化石有扁角鹿和肿骨鹿共存，证明第 10 层是处于由北京人时代的早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

最重大的发现是 1966 年在南裂隙靠近 1934 年发现北京人化石的“H”地的南边，发现北京人的一块额骨、一块枕骨和一枚牙齿化石。两块头骨碎片竟能够与 1934 年及 1936 年发现的第 5 号头骨的两块颞骨可以“天衣无缝”地拼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经过研究得知第 5 号头骨是已发现的北京人头骨中有进步的形态特征最多的一个，这说明在几十万年前向现代人类方向发展过程中，北京人的体质形态发展很缓慢，而文化发展却较快。另外，这次发掘还发现了一段赤鹿角基部，该动物在第 15 地点发现过，说明北京人遗址的顶部堆积的时代和第 15 地点相当，已经接近晚更新世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周口店的发掘是时断时续的，其规模远不如抗战前那段时间。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和发掘工作却有着极大的发展。



50年代前，一些学者在西南地区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存在的证据，经过30多年的努力，始终未取得有说服力的结果。从1913年起，埃德加（J. H. Edgar）在四川境内搜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1921年纳尔逊（N. C. Nelson）在长江流域曾采集到一些石器。1931年鲍尔斯（G. T. Bowles），1935年格雷厄姆（D. C. Graham）在埃德加主持下研究了在四川发现的标本，宣称在四川找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骨器。据裴文中观察不是人工制作的器物或属于新石器时代（裴文中，1955）。

近30年来，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台湾都程度不同地发现了人类化石或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使我们更多的了解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一些过时的说法需作修改或补充。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8年中，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和人类化石地点，就目前接触的资料统计有26处。按发现的早晚排列如资阳人及其文化（四川，1951）、丁村人及其文化（山西襄汾县，1953）、长阳人（湖北，1956）、来宾人（广西，1956）、白莲洞（广西柳州，1956）、霍霍西里（青海，1956）、里村西沟（山西曲沃，1956）、建平人（辽宁，1957）、匭河（山西芮城，1957）、柳江人（广西，1958）、南海峪（山西，1958）、马坝人（广东，1958）、北京人下颌骨（北京周口店，1959）、新太人（山东，1960）、富林文化（四川汉源，1960）、新洞人（北京周口店，1960）、清和屯（黑龙江，何市，1960年发现，1993年试掘）、西侯度（山西芮城，1960）、路南（云南，1961）、蓝田人及其文化（陕西，1963）、峙峪人及其文化（山西朔县，1963）、安图人（吉林，1963~1964）、丽江人<sup>①</sup>（云南，1964）、观音洞文化（贵州黔西，1964）、元谋人及石制品（云南，1965）、山东一号洞（山东沂源，1965）等。以上地点有的是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一起发现，有的则是只发现人类化石而没有文化遗物，有的只有石制品。以上的地点或遗址多经过发掘并发表了研究报告或简报。其中重要的有资阳人及其文化、丁村人及其文化、蓝田人及石制品、元谋人和观音洞文化。

资阳人化石地点在四川省资阳县黄鳊溪岸畔。1951年修建成渝铁路，在建黄鳊溪大桥时发现一个完整的头骨和一件骨锥及一批动物化石。资阳人代表一个50岁以上的女性个体。因为该地点地层堆积较复杂，且是修桥工人挖出，具体层位不详，故有人认为资阳人是新石器时代。1980年以来，在这一带做过多次调查，确定了其出土层位。据放射性碳素和铀系法的测定，资阳人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sup>14</sup>C测年为距今37000~40000年。

资阳人化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现的，对于以后在这一地区寻找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丁村人文化遗存是1953年因修机场取砂而发现的。1954年9月发掘，除了发现三枚人牙化石和2000余件石制品外，还发现大量的动物化石，为研究这一时期人类的历

<sup>①</sup> 在1960年以前，云南省博物馆从丽江收集到三根人类股骨化石，但未研究。1964年在丽江漾西公社木家桥发现一人类头骨化石。1977年云南省博物馆进行过报道。